

序

肖 风

卢论方志，多有创见；汇文成书，令人欣慰。它是作者从事方志指导工作与学术研究取得的可喜成果。它产生于河北方志事业深入发展的实践，成为作者对这个事业的开创、开展与提高所做的重要贡献。透过书中的志评、志序和志稿评审意见，还可窥见我们市县志的编者们的孜孜以求的精神风貌。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继承我国历代修志优良传统基础上的一项创新工程。为了继承与创新，作者在用功研究（清）章学诚以来著名方志学家诸学说的同时，致力于研究“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修新方志”（胡乔木语）。新志书编纂中的难点问题，正是作者研究的重点。有如编纂指导思想问题，作者论证了新方志之所以新，全在于指导思想之新。那么，贯穿、渗透于志书各个部分，乃至每个细胞的新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作者回答说：唯物史观。联系编纂实际，作者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观点所作的阐发，是深刻的，有启发性的。对于全国方志界所关注的增强志书整体性的问题，经深入思考，作者得出的真知是：志书的记述对象，即多样性的客观世界，本来就是相互联结的整体；只要把握了这个基本观点，就不难从志书结构的设计中，以及从所记内容的适当联结上，找到增强整体性的具体做法。关于概述，这是个众说纷纭、饶有兴味的问题，作者从概述应有的功能入手，研究得出了如下五条：总括地情，沟通联系，彰明因果，提炼精华，评量得失。这五条，大有助于概述以及全书质量的提高。大事记的记述，乍看不难理解和把握，实际上，编写起来往

往流于过滥。问题出在对大事记记述要领的理解模糊、认识肤浅。作者对于何谓大事、大事记的主线、大事记与章节大事的对应,以及大事记是志书勾勒历史发展脉络唯一的纵线等问题的分析中,把大事记的记述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如何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以及如何解决政党、政权与政治运动等的记述难点问题,是修志全面展开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全国方志界最关注的。作者做了颇有心得的研究。有如提倡设置题为“重要决策”的章节,以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以“实事求是”的提法取代“秉笔直书”的提法;以记述“文革”的主要做法与结果,而不描绘细节,从而做到既忠于事实,又贯彻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等等,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关于经济记述,针对当时的通病,作者强调加强“经济综情”、“经济效益”与“乡镇企业”等层面或专题的记述,很有指导性。如此等等,这里不一一述及了。

修志,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编修者,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把成千上万条资料占有、消化,变成科学资料书的过程和创造性劳动。志书的科学性即质量,取决于编修者的政治业务素质。素质,含有文化与专业知识、阅历与政策水平等要素,而最为重要的是学风与志德,唯有良好学风与良好志德的结合,方可铸成学术成就与佳志。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集,不论就其剖析有如结构、概述等的宏观类问题,还是处理有如标题、词语等的微观类问题,都体现了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学风,以及该肯定的就如实肯定,该批评的就深刻批评,从严、从高、从真,没有杂念的责任感与事业心。这同我们修志队伍中那种不搞学术搞权术,不讲奉献贪名利,不讲实话说大话、谎话等的不良倾向,恰成鲜明对照。应该说,在河北深入发展的修志实践中涌现的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一批修志专门家,正是良好学风与良好志德集于一身的修志楷模。这是河北取得出版 160 余部志书成就的同时,所取得的人才

培养上的重要成就。

时届新年和世纪之交，河北方志界面临着深入总结十五年来志书编纂工作、学术研究与领导工作经验的任务。通过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振作精神，从而加紧完成修志扫尾工程，搞好续志试点与提高年鉴编纂水平。正值此刻出版的这本文集，对我们的总结活动无疑是个助力。还有，作者在后记中直言文集的理论色彩不浓，作为一己之见，有些还不成熟，愿求教于方志界的朋友们。这种谦逊的、科学的态度，无疑又是一个启发，因为我们总结经验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

1999 年元旦

目 录

文 章

- 新方志指导思想刍议…………… (1)
- 对志书整体性问题的探讨…………… (10)
- 《概述》在志书中的功能及其写法…………… (18)
- 特点鲜明 功能齐全
- 评《灵寿县志》“总述”…………… (29)
- 五部县志概述篇剖析…………… (34)
- 大事记在方志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44)
- 为民族抗战树丰碑
- 评《和顺县志》对抗日战争的记述…………… (50)
- 阅读志书的向导 理解志书的钥匙
- 评《秦皇岛市志》的“总述”…………… (55)
- 展示地方特色的有益探索
- 关于《北戴河志》的几点回顾…………… (61)
- 一部农垦企业特点鲜明的志书
- 简评《芦台农场志》…………… (69)

序 言

- 《新方志编纂探论》序…………… (75)
- 《河北古代人物综录》序…………… (77)
- 《方志文集》序…………… (79)
- 《唐山市新区志》序…………… (81)
- 《枣强县志》序…………… (84)
- 《石家庄地区志》序…………… (87)

讲 稿

在丰南、遵化县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	(90)
在迁西县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	(100)
在黄骅县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	(111)
在北戴河志、昌黎县志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	(116)
新方志编纂中的政治质量问题·····	(130)
志书的体例、编写及总纂·····	(147)
在全国五部县志评议会上的发言(摘要)·····	(165)

评稿意见

对《枣强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171)
对《大厂回族自治县志》稿的评审意见(节选)·····	(185)
对《大城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194)
对《深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210)
对《高阳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233)
对《肃宁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255)
对《涞源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269)
对《芦台农场志》稿的评审意见·····	(291)
对《涉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315)
对《唐山市志》稿的评审意见·····	(332)
对《滦县综合年鉴》稿的评审意见·····	(359)
对《顺平县志》稿的评审意见(节选)·····	(366)
对《阜平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377)
对《魏县志》稿的评审意见·····	(396)

作者后记·····	(411)
-----------	-------

新方志指导思想刍议

胡乔木同志要求，必须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来编纂新方志。在这“三新”当中，核心是新观点。有了新观点才能选出新材料，才能使用新方法。

所谓新观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编纂新志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否明确，关系到新志的成败，是修志工作者必须首先解决好的根本问题。

地方志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历代旧方志，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意志的体现，其指导思想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即使有个别旧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正当要求，但其思想体系也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则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因此，编纂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穿于修志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制定篇目，搜集和整理资料，直至编纂成书，每一步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都会造成错误，甚至使修志走上歧途。

编纂新志既要做到每一章节观点正确，更要注意全志的宏观大旨，使全志鲜明地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即二者之中何者为第一

性、谁决定谁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观中的具体贯彻和表现。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和解决，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是两种历史观长期斗争和相互对立的焦点。我们编纂新志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历代旧志同历代旧史书一样，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都做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回答，即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旧志以大量的篇幅，宣扬“天命”、“天数”，或“圣君明主”的思想动机，把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卓越人物的思想动机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否认社会发展有它本身的固有的客观规律，否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列宁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主要缺点，而且为我们清除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指明了途径。

在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过程中，公然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恐怕没有了。然而，原则上赞成同理论上、思想上的彻底解决并不是一回事。应当承认，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这种错误观点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这同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有关。从50年代后期泛滥开来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其思想理论根源之一，就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忽视了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研究。1960年冬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许多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把历史唯心主义推向极端，认

为可以凭主观意志为所欲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坚决清理“左”倾错误的影响，认真研究我国国情，特别是研究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措施，才使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我们对于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不可低估。在编纂新志的工作中，不仅要把旧志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的根本颠倒再颠倒过来，而且要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加深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解，使这一观点在新志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我们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它的另一个方面，即必须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如果无视这种反作用，那就会得出人们只能被动地、消极地坐等客观条件成熟，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悲观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面坚决纠正“左”倾错误，一面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努力进取，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这充分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我们编写新志，对于这些要大书特书，这样才能完整地体现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辩证性质。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只有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的发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革。无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多样，在本质上都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并可以从经济基础得到科学的说明。然而，上层建筑决不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它一经出现，就要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完善。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

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6 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了这两个方面，才是坚持了理论的全面性。

旧志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对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一样，也是根本颠倒了的。旧志往往把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等等说成决定一切的东西，而经济状况则被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清光绪年间修成的《畿辅通志》，洋洋 300 卷，1000 多万字，对河北经济状况的记述却少得可怜。全志分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沿革、封建、职官、选举、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宦绩、列传、杂传、识余等门类。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对于当时农业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商业和交通运输等等的经济活动，都没有专门记载。占了最大篇幅的关于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活动的记载，则是从上层建筑到上层建筑，根本看不出它们同经济基础的联系，更不必说如何揭示两者的辩证运动过程了。这是旧志的一种通病。

我们现在编纂新志，必须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对各个时期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的记述摆在主要地位。要深入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等等都要认真研究，对于农业、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财税、金融等各种经济的历史和现状，都要全面记载。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记述就不重要了。新志对于政权、党派、兵役、司法、宗教、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各个部门及其活动，同样要认真研究，详细反映。但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不能离开经济基础去研究；对于上层建筑变革的原因不能只是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中去寻找，而应

该从经济基础的变革中给以科学的说明。同时，在记述中还必须注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反映两者的矛盾运动。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如何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必然延伸。凡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必然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反之，则必然抹煞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31 页）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之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些都是最明显而又最重要的事实。

然而，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或者夸大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作用，认为只有那些“圣君明主”、天才人物才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或者认为历史发展取决于某种客观精神、取决于上帝、神和天命，而具体到由谁来体现客观精神的时候，仍归结到“超人”、英雄。所以两者殊途同归，都是英雄史观。

历代旧志往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混合产物，既宣扬帝王将相、名宦乡绅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又宣扬天命、神力无法抗拒的神秘观点。而作为历史的真正主人的人民群众，在旧志中却没有任何地位。旧志一般是把人民群众写成愚昧无知的“群氓”，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旦对压迫者有所反抗，便被诬为“盗”、“贼”，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学者，在他们主修的志书中曾经比较公正地记载了一些人民群众的活动。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无法脱开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在回答谁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唯物主义倾向便黯然失色了。

现在我们编写新志，如何写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有关各种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靠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新志要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肯定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聪明才智和伟大业绩，反映他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从而激励人民群众继往开来，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对于这一点，修志人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而如何认识和记述个人（这里指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个人，首先是对社会前进起过推动作用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则要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曾经出现过要求过苛的偏向，即用现代标准要求于古人，以致本该肯定的也被否定了。这种偏向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按照这个道理，在新志中不仅要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劳动人民中的能工巧匠以及在某个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民间知识分子歌功颂德，就是对于曾对历史发展起过推进作用的上层人物，也应该事实求是地加以肯定。对现代人物的记述，同样不可求全责备。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固然应该大书特书，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工程师、科技人员等知识分子的业绩，也要充分记载，使他们在新志中居于应有的地位。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一个地方人民的解放、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以至生命。新志对此应该如实反映。但是，记述革命领导干部的事迹，必须把领导干部放在领导集体之中，放在群

众之中，切不可凌驾于领导集体和群众之上。离开了集体，离开了群众，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无法得到发挥的。而且，一个领导者的作用，只有通过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广大群众的实践才能得到表现。摆正这个关系，至为重要。

上面说到的都是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个人，对于全面记载历史和现状的地方志来说，不只要记载正面人物，就是那些对历史发展起了阻碍作用的反面人物，也应该适当有所记载，让他们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坚持以正面人物为主；二是实事求是，对正面人物不人为地“拔高”，对反面人物也不人为地贬低。这样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正是这种基于根本利害冲突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的变革，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历代旧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回避阶级斗争的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并不是说在旧志上完全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的记载，这种记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是，第一，斗争双方的阶级属性被掩盖了；第二，产生斗争的根源和斗争的结局被歪曲了。于是，阶级斗争在实际上被否定了。新志则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载阶级斗争，用事实说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阶级斗争及其作用，也是历史地发展的。对于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既要肯定其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又要注意其历史局限性。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但无产阶级也有一个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程，这在新志的记载中是必须注意的。

在阶级社会，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各种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如何去分析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只有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才能认清本质，掌握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只是对于政治设施、政治斗争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对于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观念体系，也要进行阶级分析。许多旧志在《名宦》、《乡贤》等目下，记载了不少达官贵人和乡绅的“政迹”、“善行”。我们在编写新志的时候，就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政迹”、“善行”对哪个阶级有利，切不可盲目选用。

在阶级社会，阶级现象是大量的和普遍的，但不是唯一的和囊括一切的；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但不是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阶级分析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子，到处乱套。尤其是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现象，更不能乱贴阶级斗争的标签，以致重复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

上面所讲的是编纂新志中应当掌握的几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就地方志中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谈的。但地方志除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内容以外，还有自然领域的内容，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和发明创造，也是地方志应当记载的内容。要做到所有社会和自然方面的记载观点正确，仅仅掌握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这正是修志人员最需要的基本功。

修志的原则之一，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这届修志的下限，是新志记载的重点。这一时期内各种斗争之错综复杂，各种事物发展演变之快，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要写好新志的这个主要部分，除了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外，还必须熟悉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曾经作过两次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特别是后一个《决议》，是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历史问题的典范，应该成为我们记述革命斗争大事的准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在编写新志中，认真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正确认识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所绝对必要的，对于正确认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编纂新志的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自觉地使修志工作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才能使新志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修志的指导思想问题所涉甚广，上面仅就正确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就教于高明。

(1984年12月发表于《河北地方志通讯》创刊号)

对志书整体性问题的探讨

一、志书的整体性是由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决定的

地方志是反映一地自然和社会全貌的综合性著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自然界中各自然现象之间及社会领域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使客观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地方志要反映的正是这个交织起来的画面。因而，它就无法抛开对构成这个画面的“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反映。河北省省志篇目之所以以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为序横向排列，正是为着体现客观世界的有序性。因为自然环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舞台，它的变化对一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经济又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制度则对文化及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制约作用，只有这样排列，才能正确反映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五大部类的有序排列，只能在志书中高层次、粗线条地体现客观事物的有机联系，而事物间的作用是交织的、复杂的。比如交通与商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农业内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农业生产之间，都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交织的联系就不再是仅靠类目排列的先后顺序能体现得了的了。必须在志书中通过对事物的具体记述，体现事物相互间潜在的关联性，从而正确反映各事物在普遍联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被浓缩到地方志中的那个“交织起来的画面”依然保持其整体性。应该说，地方志书的整体性不是外加的、臆想的，而是由客

观存在的整体性所决定的。

二、资政的功能要求志书必须具有整体性

编写地方志的目的首先是资政。这一功能作用也要求志书具有整体性，以提供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资料，能够作为施政的依据。

所谓有组织、有系统的资料，也就是按照一定关系能够组成整体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而且必须能够正确反映事物在客观存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只能从事物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联系中反映出来。比如水利志记述水利，就应该通过对水旱灾害的记述，通过对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用水情况的记述，反映出水利建设在生产和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当前生产、生活对水利建设的要求，作为施政者制定水利政策之依据。其次，方志资政的功用还体现在提供历史借鉴上。这就有一个反映经验教训，体现发展规律的问题。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从事物的兴衰成败中得出的。这就要求志书不仅记述事物兴衰起伏的变化过程，而且还要反映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过程。前一段时间，方志界曾就地方志能否体现规律和要不要体现规律的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志书功能的理解还不深，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它反映了修志者对志书到底应该反映一些什么内容和如何反映这些内容心中无数。志书中所要反映的是一地各项事业的发生和发展的变化过程，着重在新旧社会本项事业的历史变化特征、建国以来的事业发展状况。以农业志为例，它应该通过对解放前后及解放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的记述，通过对农技农艺、农业机具及粮食产量的变化的记述，体现出农业生产与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出在什么情况下农业生产就发展，在什么情况下农业生产就会受到挫折，从而具体体现出经验教训。这样也就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

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问题是,修志工作者如何去认识并在志书中去反映规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子,即观察任何事物,都应将其看作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而不能抛开事物间的联系而进行孤立的记述。只有这样,才能够反映出经验教训,体现出客观规律。否则,资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三、志书能够体现客观存在的整体性

有人认为,虽然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决定了反映客观存在的志书的整体性,资政的作用也要求它必须体现整体性,但由于地方志横排门目的传统体例形式,即将相互联系的各个事物分门别类,分解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专志予以记述的形式,以及志书客观的记述体及囿事于一业,反对互相侵扰的专业性特点,难免会带来志书的割裂感。

我们认为,旧志确实存在各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联系和缺乏逻辑关系的弊病,但不应该把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简单归之于横列门目的形式。说到底这是因为当时的编纂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事物,而是把一个个具体事物和现象置于孤立和静止的地位去观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孤立记述,出现割裂感也就为势所必然。这届编修新志,我们虽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但仍基本上继承了志书传统的横排竖写形式。这说明只有这种形式才最适应于表现方志包罗万象的内容。那么,是否新志就一定不可摆脱旧志的那种割裂和破碎感呢?当然不是。诚然,分门别类的确是在形式上将相互联系的事物分解开来,如把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分割为许多并列的行业,在一个行业之内又依据行业内部的分工,分解为若干个门目。加之百业人修百业志的组织方法,确易使人因着这种分解,从主观上把事物孤立起来。但这决不是说割裂是